

荒漠中的玫瑰——《藝術》季刊

首波高雄現代繪畫運動是由雜誌所掀起的。1972年9月，高雄美術天空靈光閃過，第一份藝術專業雜誌——《藝術季刊》——誕生。《藝術》由許多藝術家集資創刊，只發行三期，但在高雄美術發展史上，卻猶如挺立在荒漠中的玫瑰，顯得孤獨又耀眼。早期高雄美術的發展，以創作和展覽為主，除了報紙上的訊息和簡短報導之外，缺乏其他出版，論述幾乎付諸闕如。美術在這個缺乏論述的時代裏，不僅發展遲緩，所謂「藝術」也僅限於「畫法」的傳習，美術生態嚴重的缺了一塊。

六〇年代末，以「東方」「五月」為代表的台北現代繪畫運動已經接近尾聲，但，七〇年代的高雄仍然一片荒蕪。《藝術》集合了畫家、音樂家、詩人等，彼此唱和，搖旗吶喊，多少帶著現代繪畫運動時期的「台北經驗」。從成員來看，《藝術》除了凝聚當時高雄文化圈的地力道外，也引介「外力」助陣，是高雄為現代美術搖旗吶喊的先鋒。

在那個荒蕪的時代中，《藝術》為高雄現代美術帶來了第一道曙光；它短暫的生命像是一粒落地的麥子，對現代藝術在高雄萌芽，功不可沒，此後，藝術家自己辦雜誌，成為匯聚高雄文化動能的主要模式。

「高雄腔調」的形成：高雄美術雜誌觀察報告

文 / 陳水財

在地發聲——《藝術界》

七〇年代，台灣社會面臨了空前的轉變，文化風向陷於一片「鄉土」的風潮中。這場風潮由文學揭開序幕，在媒體推波助瀾下，「鄉土」思維迅速席捲全台。美術上，以之呼應的「鄉土寫實」風格，成為唯一判準，瀰漫在學院與所有展覽中。當時以台北為中心的畫壇熱鬧非凡，《雄獅美術》(1970)《藝術家》(1976)相繼創刊，「鄉土」的象徵——洪通畫展——在《藝術家》及其他媒體的渲染下，沸沸騰騰。相對的，「邊陲」高雄在這個年代裡卻是實質的沉悶，許多藝術家都處在驚居的狀態中，美術仍是高雄的「極弱音」。在凝滯的空氣中，「坐南向北」，總讓人無限感慨。這種沉悶狀況，八〇年代起才有所改善，藝術家開始發揮動能。首先「南部藝術家聯盟」(1980)「夔藝術」(1983)先後成立，接著《藝術界》(1985)在洪根深林泉街住處創刊，為往後高雄畫壇掀起一片波濤。

煙囪、貨櫃、鐵锈、港口、機械，加上耀眼的陽光，以及熾盛的熱情，交織成剛烈的高雄場景。《藝術界》在這樣的場景中誕生，以「揮舞著無邊熱情，唱自己的歌」作為創刊詞，一開始即以「高雄」作為思索起點。《藝術界》是熱情的匯聚，音量即使微弱，卻是道地的「在地發聲」，尤其對高雄美術環境投以最熱切的關注。對美術館籌設、高雄藝術季、兩千人美展、雕刻公園等地方美術議題，都以撰文或座談的方式，痛下針砭，表達高度關切。

在氣氛沉悶的時刻，《藝術界》沸騰的熱血與無所不在的「關懷」，成為高雄美術環境中刺耳的「雜音」。另一方面，畫家們藉以相濡以沫，建立起往後彼此攜手，在高雄開疆拓土的革命情感。《藝術界》屬「圈內」刊物，就社會面觀察，發行數量與發行對象均有侷限，散發熱情的意義遠大於理念傳播的功能。此時，整個高雄美術環境逐漸有了轉變：高美館正式進入籌備階段(1985)，「高雄現代畫學會」成立(1987)，《民衆日報》開闢「民衆藝評」(1987)，《炎黃藝術》創刊(1989)。《藝術界》於1989年11月發行最後一期(20期)後畫下句點，功成身退。



衆聲喧嘩的年代——《炎黃藝術》《文化翰林》《南方藝術》

《炎黃藝術》的創刊，標誌著高雄美術新時代的來臨。

八〇年代末期，政治解嚴，社會力開始釋放，經濟景氣循環來到高點，房地產事業正值巔峰，藝術市場一片欣欣向榮景象。1989年在林明哲的號召與李朝進的策劃下，成立「炎黃藝術館」，並發行館刊——《炎黃藝術》。「炎黃」本身是一個異數，也是空前創舉；林明哲以個人高度的整合力，串聯了數十家建設公司一起出資經營，是一次社會力量的大結合。《炎黃藝術》從館刊到轉型成為一本正式上市的刊物，雄厚的財力是主要的後盾。

九〇年代的高雄，各類型的藝術空間相繼出現，各方力道競逐，美術環境驟變。藝術空間除了「炎黃」外，「積禪」「串門」「阿普」「翰林苑」「杜象」「積禪五十」「台灣櫬窗」「串門學苑」「三愛」「高雄帝門」「琢樸」「山美術館」等接踵成立；而「高美館」開館（1992）、八〇年代末出國的藝術家此時陸續回國、新生代藝術家出道，高雄美術界一時喧騰。

這是個衆聲喧嘩的時刻，美術雜誌方面，除了《炎黃藝術》外，《文化翰林》《南方藝術》也適時介入，一起見證了九〇年代高雄美術的關鍵發展，也共同為高雄的美術天空劃下了幾道驚嘆號。

《文化翰林》（雙月刊）1992年創刊，由「翰林苑」畫廊發行，李朝進仍為主要策劃人。《文化翰林》採贈閱方式，共出刊七期。

《南方藝術》由一群藝術家集資創刊，李俊賢是主要的策劃者，成員主要來自「高雄現代畫學會」，也引進了其他社會資源。

《南方》的誕生堪稱是一項「高雄傳奇」。《炎黃藝術》和《文化翰林》都由財團斥資，《南方》則是藝術家力量的大會串，包括出錢與出力。「高雄現代畫學會」自創會以來，即活躍在高雄文化界，活力十足，介入地方文化事務的狀況幾乎已到「無役不與」的程度，甚至不惜給予嚴厲的批判。《南方》的發行雖不屬「現代畫會」的會務，但從參與的成員及雜誌的風格來看，「現代畫會」的色彩濃厚。藝術家們自己出錢、自己撰稿、自己編輯、自己拉訂戶，他們延續《藝術界》時代的熱情，卻更具有組織，也更具企圖。他們積極吸收廣告、開拓訂戶，想藉由商業運作融入社會網絡中，走出「圈內」雜誌的宿命。但藝術家的熱情終不敵現實的壓力，1997年發行第22期後，「金」疲力竭，宣告停刊。

「炎黃」於1996年改組，隸屬「山集團」，稍後《炎黃藝術》亦改名《山藝術》，1997年12月出版最後一期。《文化翰林》則早在1993年7月即已停止運作。隨著景氣低迷，民間活力消退，燦爛一時的高雄美術雜誌的時代，到此暫告一個段落。

高雄腔調與在地論述

由於媒體上的弱勢，過去高雄一直是一個「失聲」的都市，因此，美術雜誌對高雄人而言，一直是縈迴心中的夢想。

七〇年代初的《藝術》季刊，標榜「純藝術性之刊物」，帶點潔癖，「藝術」氣息濃厚，猶可嗅到「五月」「東方」時期的味道；八〇年代中的《藝術界》開始強調在地發聲，介入美術「俗務」，開高雄在地論述之端。倪再沁在《高雄現代美術誌》中認為：「《藝術界》發掘了好幾支筆」；循此而言，而同一時期的「民衆藝評」則發掘了好幾張「嘴」。在《民衆日報》副刊主任張詠雪的策劃下，「民衆藝評」初期以

《炎黃藝術》1989年9月創刊，發行人林明哲，社長李朝進（後由李雄慶接任），社務委員35人，大多是當時高雄建築界的人士，也包括其他社會菁英，總編輯為陳水財。編輯群包括：郭定宇、吳慧芳、吳惠美、吳麗娟、李官權、王邦珍、蘇淑貞等。社務委員：方吉雄 方健良 李彥實 吳何堂 吳瓊興 吳建國 林庭澤 林南進 林燦基 施竹華 周光宙 洪振卿 洪維鴻 余燦泉 孫太山 發述正 高天龍 張宏全 張介豪 陳武聰 陳伯安 陳俊銘 莊國儒 黃原茂 黃萬億 黃希成 董明得 曾登茂 蔡永裕 蔡賢 蔡南彰 蔡福源 閻萬裕 蘇承波 謝金樹

《文化翰林》（雙月刊）1992年6月創刊，由「翰林苑」發行，董事長張介豪，李朝進是主要策劃人，總編輯王廷俊。



《藝術界》1986年創刊，發行人洪根深，社長陳水財，創刊成員尚包括：李俊賢、蘇志徵、宋清田、陳茂田、陳隆興、黃世強等。可以說，他們都是在七〇年代之後才陸續進入高雄畫壇的，其中洪根深、陳水財、李俊賢、陳隆興曾經是「南部藝術家聯盟」的會員，後來他們都是「高雄現代畫學會」的基本成員。

《藝術》1971年由一群藝術家集資創刊，詩人畫家宋沉冬是靈魂人物，畫家李朝進扮演重要角色，此外，成員有畫家劉文三、陳庭詩、莊喆、羅清雲、黃明韶，音樂家陳主稅、蕭泰然、林榮德，詩人白浪萍、扈東、顏回等。



「民衆藝評」由民衆日報副刊主任張詠雪策劃推動，1987年5月26日第一次推出，1988、1989年間出版密度最高。初期主要參與者為：倪再沁、陳水財、洪根深、何從等，蘇信義、李俊賢、蘇志徵、吳梅嵩、張新丕、王武森、黃岡、唐自常等高雄藝術家都曾是座上賓。



每週一次，定期刊出。透過報紙強大的傳播力量，高雄美術的在地論述，遂在「民衆藝評」中逐漸建立了「強悍」「直言」的高雄腔調。

《南方藝術》在九〇年代中期崛起，雄心萬丈，延續《藝術界》與「民衆藝評」的香火，以「高雄腔調」發聲，突顯高雄本色。《炎黃藝術》以立足高雄自豪，它的存在幾乎橫跨了整個九〇年代，堪稱是高雄最具續航力的美術雜誌了。1995年曾獲得文建會「雜誌金鼎獎」，是一朵綻放在高雄土地上的燦爛花朵，無疑，也是另一種質感的「高雄腔調」。

從《藝術季刊》《藝術界》到《炎黃》《文化翰林》《南方》，幾經轉折，高雄終於確立了自己的發言權，不再聽令台北的號音，可以大聲證明自己的存在。雜誌提供論述空間，驅迫許多高雄藝術家披掛上陣，在地之眼看在地之物，以在地之筆寫在地之事。在地雜誌厚植了在地論述的能量，取得高雄對自己文化的詮釋權，為九〇年代高雄美術景緻的營造，搧風點火。

此外，《炎黃》還培養了一批雜誌策劃撰編與經營的能手，他們現在大多繼續從事相關工作，「炎黃經驗」仍受倚重，這是高雄美術文化中一股紮實而不可忽視的在地力量。

在地文化場域的建構

雜誌其實也建構了一個「場域」，創造了一個社會平台。在這個平台上，精英／大眾、學術／消費等交會撞擊，相互權威。法國當代學者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認為，藝術場域是一個權力角逐的場域，「位階」與「卡位」形成複雜的客觀關係網路。雜誌也是一個微形社會，商業、創作、媒體、論述、廣告在此操演運作，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當初《炎黃》經營的動機曾遭到質疑，認為是為所屬企業或個人粉粧。無可諱言，雜誌以文化身段面世，對企業或個人形象的塑造具正面意義；但重點不是誰因此獲益，而是企業或個人受益是否危及他人利益？其效益是否合乎社會公義？整個社會是否因此蒙受利益？換個角度，《炎黃》在高雄搭建了一個遠離台北，可以自行運作的在地舞台，吸納美術能量，對九〇年代高雄的文化生態，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南方》在創刊詞中提到：「早期的藝術媒體，特別強調學術、專業，往往模糊成一片孤僻冷漠的性格，得到了『清名』，卻失去了群衆……」，即有走出「圈內」、找回群衆、確立商業化經營方向的必要。高雄美術雜誌由「同仁」性質走向商業化，並非理想的消失，也不是單純的生存考量，而應視為是一種場域疆界的擴張。

本來，社會就不像一個控管嚴格的科學實驗室，而是充滿了各種的可能與雜音的現實世界。從九〇年代的「高雄現象」來看，在這個由美術雜誌所建構起的高雄藝術場域中，各方力道匯聚。在此，企業家頂著贊助者的光環，藝術家尋覓伸展的舞台，畫商測探市場風向，策展人串聯論述，媒體追逐，大眾爭睹，學者觀察搜索……；這裡也糾葛著理想與現實、公益與私利、堅持與妥協、願景與野心、卓見與偏執、保守與激進……。這樣活生生的「真實」，這樣生機無窮的「場域」，正是《炎黃》所試圖描繪的文化願景。

九〇年代高雄美術的榮景與空前的活力，固然是大環境使然，但由美術雜誌所架構起的在地文化場域，無疑是催策高雄藝術動能的重要關鍵。

結語：期待美術雜誌的春天

高雄美術雜誌的春天是否已經一去不回？這是近幾年來最令高雄美術界興嘆的話題。最近談到高雄，大家經常掛在嘴邊的是，「愛河變美了！」。這幾年，高雄彷彿脫胎換骨：捷運已經啓動，大型文化節慶一場接一場，都市景觀大幅改善，謝市長正帶著傲人的「高雄經驗」北上組閣……高雄未來充滿了希望。相對於這些，美術界卻只有一個小小的心願：期待高雄的美術雜誌能夠真的冬盡春來。